

基督教经典译丛



Augustine

The Harmony of the Gosp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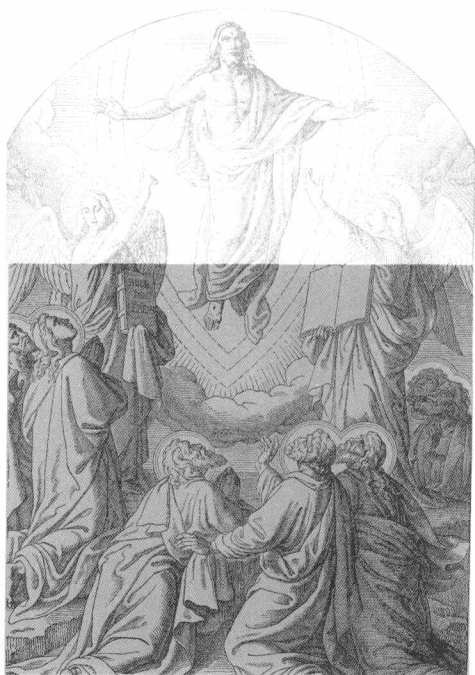
论四福音的和谐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S.D.F. 萨蒙德 英译 许一新 译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The Harmony of the Gospels 论四福音的和谐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S.D.F. 萨蒙德 英译 许一新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四福音的和谐 / (古罗马) 奥古斯丁著; 许一新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2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341-3

I. 论… II. ①奥…②许… III. 圣经—研究 IV. 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3592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 数 288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

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

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國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

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官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19章18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

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

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一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 世纪），中古时期（6—16 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 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 17 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 16 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008 年 11 月

中译本导言

李锦纶^①

奥古斯丁的《论四福音的和谐》合共四卷，一般认定在公元 400 年写成。^②这一时期是奥古斯丁反摩尼教争辩的最后阶段，不过内容并没有明显涉及反摩尼教的议题。^③然而护教的写作动机是很明白的，^④目的是回应当时的人们对于已经普及于罗马帝国的基督信仰的反对，他们针对四福音之间的不同而挑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找出基督教的矛盾。《论四福音的和谐》正是奥古斯丁尝试对四福音的异同点作出详细的交代。虽然从圣经研究的角度审视，他对原文的掌握有欠精确，但从神学角度看，却又颇具现代意义，而且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以基督为中心的论调。第一卷属于总论，回应当时反对基督教的人士所提出的质疑；第二及第三卷以最后的晚餐为分界处理福音书的内容，以《马太福音》为参照解释它与其他三本福音书的差异；第四卷审视《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独特之处，结束对四福音和谐问题的系统性论述。以下就各卷举例说明奥古斯丁的独到

① 笔者为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国际教父学学会（IAPS）会员。

② 见 Eugene Portalié, *A Guide to the Thought of Saint Augustine*, trans., R. J. Bastian, reprint ed.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5), p. 403.

③ 书中偶然提及跟摩尼教的争辩，例如《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一卷第五章第八节。

④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一卷第七章第十节。

见解。

福音书的权威

奥古斯丁一开始便以基督在启示历史中的关键性来建立四福音的权威，^①他认为四福音比其他圣经书卷更为重要，因为所记载的基督是先知与律法所代表的旧约的成全，而其内容真实性的保证，则是来自亲身跟随基督的使徒（马太与约翰）并他们的跟随者（马可与路加），在圣灵的保守下，通过从基督直接领受或经过严谨考据而得，把发生的事如实记录下来，^②其正统性得到大公教会的确认而被接纳为圣经的正典，因此，四福音书跟其他冒牌的福音书有极大的分别。那些作者不但缺乏值得令教会信服的品格，更蓄意把教会所拒绝的教导偷偷混进他们的作品中，今天仍然可以从次经中读到这一类的福音书。奥古斯丁的论述涉及神学的四个范围：救赎历史的发展、使徒统绪的权柄、上帝通过圣灵的护理和大公教会公认的见证。这些都成为了今天的系统神学著作中，用以建立圣经权威论证的基础。

上帝并非神明偶像

为反驳有人认为基督利用法术使人皈依，奥古斯丁提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神学论据，说明犹太人所敬奉的上帝与别的神明在本质上的区别。^③虽然人认为神明理应保护向其膜拜的人，但犹太人的上帝却让属于自己的子民被别国欺凌，这完全不合乎一般人的逻辑思维。他解释这是因为上帝的主权，其实行乃基于公义的原则，因此犹太人被

①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至第二节。

② 参见《路加福音》1：1—4。

③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一卷第十二章第十八节至第十三章第二十节。

欺压其实是上帝对他们犯罪的审判，证明了上帝并不受限于犹太民族。事实上，犹太民族只是预表将临的基督国度，基督既然已经来临，便把救恩的福音传遍世界，犹太民族也因此完成了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相对而言，奥古斯丁以罗马人立国的神明罗慕路斯举例说明神明偶像的最大问题，是在于他们的非道德性，甚至是反道德性！罗慕路斯自己犯下杀兄弟的罪，并为其他罪犯设立保障，让他们到他那里逃避刑责，但却无归正、赎罪的要求。奥古斯丁质问罗慕路斯杀死没有冒犯他的兄弟的动机时，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症结：只是为了自私自利地夺取绝对权力，而不是为了大公无私地争取公义公平。这正反映了神明崇拜的核心价值是在乎利益关系，也显明了膜拜神明之人的私利动机。贿赂性的宗教毫无道德超越性可言，这便是假神与真神之间的基本分别。费尔巴哈断言人通过价值投射创造自己的神，但真神却超越了人所期待的想象。^①

基督的特殊身份与家谱问题

为要辩明基督既是从上帝而生的神子，却又在降世为人的过程中借着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奥古斯丁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提出基督被称为大卫子孙的合理性，^②一方面肯定了耶稣基督只是从母亲马利亚所生，与约瑟并无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确认约瑟对于耶稣，比养父更

① 费尔巴哈的宗教投影论准确地形容偶像崇拜的问题，但却严重误判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其原因是将基督教信仰非历史化；参见 Klaus Bockmuehl, *The Challenge of Marxism: A Christian Response* (Downers Grove: IVP, 1980), pp. 67-68。

②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二卷第一章第二至第三节。

为实在，堪称其在世上的父亲，因为约瑟与马利亚保持着真夫妻的感情。奥古斯丁想说的是借着马利亚与耶稣本来的完整母子关系，约瑟作为马利亚的丈夫在名分上也得了作为真父亲的身份。

与此相关，奥古斯丁需要解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家谱从约瑟至大卫之间所出现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序列。^① 马太记载的是君王族谱，而路加记载的则不是，结果出现约瑟有两个不同名字的父亲。奥古斯丁以古代领养孩子的风俗为论点，推断路加所记录的是约瑟养父的名字。现代圣经学者认为路加所记载的很可能是马利亚的族谱^②，但在缺乏其他论证的情况下，奥古斯丁的推论起码为他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

彼得否认基督的心灵状态

在四福音的对比研究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是彼得否认基督的实际顺序。耶稣预言在鸡叫以前彼得三次不认他，^③ 马太、路加、约翰所记的正是如此发生，^④ 只有马可有所出入，说彼得在鸡叫两遍之先三次不认主。^⑤ 到底彼得否认主的过程跟鸡叫的次数应当如何关联才不致产生矛盾？这是奥古斯丁需要解决的难题。他首先肯定四福音各段经文表达了两点的共同意义：^⑥ 彼得三次重复否认耶稣，并且否认的行动

①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二卷第二章第四节至第三章第七节。

② 其主要论据是《路加福音》开头两章的内容即以马利亚家族的角度所记的故事，因此第三章的家谱来自马利亚是合理的推断。果真如此，马利亚也便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马利亚而生也直接接续大卫的血统，在此便需要接受约瑟在这族谱取代了马利亚的名字的可能性。讨论见 Norval Goldenhuys, *The Gospel of Luke*,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pp. 151—152。

③ 《约翰福音》13: 38。

④ 《马太福音》26: 69—75; 《路加福音》22: 54—62; 《约翰福音》18: 15—27。

⑤ 《马可福音》14: 66—72。

⑥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三卷第二章第七节。

在鸡叫之先开始。奥古斯丁从经文的字面意思所提供的解释空间作了第一层次的处理，关键在于利用“开始”一词的引申解释，将着眼点从事情发生的某时刻转移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上，打开了讨论延续性时段的问题，这样做是为着第二层次的解释铺路。

奥古斯丁希望指出彼得否认主的实际并非只发生在时间的某一刻（比如说否认的话那一刻），而是在恐惧中“持续”拒绝承认基督的心灵状态。奥古斯丁这样的处理与他在《忏悔录》十一卷中所提出的主体时间观可以视为一种关联。他所提出的所谓“灵魂的散落”（*distensio*）的经验，用现代哲学语言加以解释，就是指意识主体经历了时间的绵延，是在心灵状态中所经历的实际，如此的经历让意义得以从中凝聚而产生。^①换言之，彼得否认基督从心灵意义上来说，一旦在某时间点开始产生了拒绝的心态之后，必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问题得到纾解为止，故耶稣对彼得最后的一瞥与彼得因内疚而引发的痛哭，对其心灵状态的转变都有关键性意义。

揭开门徒心灵的蒙蔽

讨论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显现的事件中，奥古斯丁提出为何两个门徒在路上一一直没有看出是复活的耶稣在跟他们谈论，一直等到晚餐掰饼谢饭的那一刻才发现是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②奥古斯丁排除了基督因为外表有所改变而未被门徒认出的可能性，却认为这必定是门徒心灵顿时得到开启的结果，于是这里便牵涉入领悟真理的实际能力。同样的客观实际，却可能因人没有领受

① 见拙著《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台北：中福，2004），247页；另拙文“动态永恒与历史时空”，《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37期（2004年7月），34页。

②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三卷第二十五章第七十二节。

真理的切合心灵状态而不能看见，他认为这种心灵的阻隔也许来自魔鬼，使门徒不能认出复活的基督，但是基督掰饼的行动却使门徒突破了本来的蒙蔽。在此，奥古斯丁采用了圣礼的属灵能力为论证的前设，以饼所代表的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作为上帝救恩的载体，因此凡是参与在其中的都得着上帝借着基督成就的救赎恩典，这包括除掉人类心灵障蔽的能力，上帝的恩典能够克服原罪带来的腐朽。

奥古斯丁的“原罪观”讨论了人类的两个基础性问题，就是“心灵上的无知”(*ignorantia*)与“行为上的困难”(*difficultas*)^①，后者是指出人类知道何为善但不能行，相反的是不想做的恶却乐意去做，中国传统说的是“知难行易”，但是奥古斯丁认为刚好相反，堕落的人性是“知易行难”，不过要“知”比一般的良善更高的真理，便连“知”也会有问题，非得有上帝的恩典，否则不能明白。这是奥古斯丁“恩典论”的核心思想，与“原罪论”相呼应。

《约翰福音》的独特性

在四福音中，奥古斯丁特别看重《约翰福音》的地位，他把其他三卷福音书归类为关于基督在世的言行，却认为约翰则透视了基督在天上的奥秘，因此奥古斯丁仿佛是以从天上往下看的眼光来解读其中每一项细节。比如他以为在记述“五饼二鱼”的神迹中，约翰最后提到耶稣退到山上以逃避众人因见神迹而拥戴他为王，奥古斯丁解释“退到山上”是表明耶稣基督的真正统治不在地上，乃是以超乎众

① 这两个词在奥氏395年左右的著作《论自由意志》第三卷第十八章第五十二节首次出现，但其意思可见于更早的著作，见拙著 Kam-lun Edwin Lee, *Augustine, Manichaeism, and the Good*, *Patristic Studies* 2, ed. Gerald Bray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 108, n. 10.

人的高度统管着我们的的心思。^① 我们虽然不一定同意这样的寓意解释，但又不能不欣赏他坚持的一贯性，掌握心灵层次的“高度”是奥古斯丁能透视许多问题的关键，他认定了约翰看准耶稣基督与上帝有同等地位的神性，因为两者原为一，耶稣基督便成为了提升人类的管道，超越物质界才能领悟属灵的事物，“参与”在基督之内成为人得以提升，并且得着永远生命的方法。^② 简言之，奥古斯丁以其“三一论”作为解读《约翰福音》的主导思想，以此确立基督的神性地位，从此也反映人类的依存性。人无法自力得救，即便是已经蒙受赦恩的人，也无法期待在现阶段仍活在能腐朽的肉身之内而得以完全。然而，这并非鼓励在世界上的放纵，而是要更加追求以仁爱为实的真正伟大生活。^③

奥古斯丁对于汉语神学发展而言十分重要，不但是因着他在西方教会神学所产生的一千多年的深厚影响让我们不能忽视，而且是因其所提出的“原罪论”与“恩典论”更成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值得深思的课题。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对人性堕落的适切了解，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看见仁与不仁之间存在着非对称关系而使他叹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④。不仁似乎是自我的“自然”倾向，故“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⑤ 但是对于罪咎，良心却没有获得赦免的清理，使国人常常活在不真实的道德理想主义之中，从而产生实际生活的伪善面子文化。

①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四卷第十章第十五节。

②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四卷第十章第十二至第十四节和第十八节。

③ 《论四福音的和谐》第四卷第十章第十九至二十节。

④ 《论语·子罕》18。

⑤ 《论语·宪问》6。

奥古斯丁《论四福音的和谐》的汉译不但向汉语世界见证了这位具有代表性的初代教父对真理的执著，也提供给读者理解福音书不同写作角度的参考，不过笔者认为最特别的经历是让我们在阅读中有寻宝的惊喜。《论四福音的和谐》好像是奥古斯丁思想的迷宫，为使四福音内容和谐一致而运用了他所有能够派上用场的神学观念，在二十五万言的文字中，读者随时都会有新发现！